

委托—代理关系分歧与中东地区武装组织的策略选择

朱翊帆 余纲正

[内容摘要] 自冷战以来,武装组织对许多国家的建构与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国际秩序与地区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愈发受到关注。现有文献多从作为委托方的国家视角来考察其与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相对忽视了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自身的行为逻辑。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关注武装组织作为代理方(或“被委托方”)所具有的能动性和自主性,通过考察委托—代理关系出现分歧时武装组织的策略选择,分析其会基于何种战略考量处理与委托方的关系。本文根据“反叛行为”和“反对表态”将武装组织在和委托方国家出现分歧后的行为分为“追随”“背离”“退出”“抗议”四种。在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严重分歧时,武装组织会首先评估自身是否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在保障短期生存的前提下,武装组织会研判自身现有军事实力和军事潜力在“继续追随”情境下所可能产生的变化,从而最终选择不同的行为策略。借助对中东地区多个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相关案例的考察,本文尝试打开武装组织决策制定的黑箱。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研判武装组织的行为,也能更加全面地把握动荡地区的安全格局与秩序演进。

[关键词] 武装组织 委托—代理关系 代理方自主性 安全合作 中东地区

[作者简介] 朱翊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余纲正,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4)05-0070-27

一、问题的提出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家行为体作为国际体系中完全主导力量的地位发生动

摇,各式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开始上升。其中,拥有军事能力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国家直接控制的领域之外运作,这成为国际和地区政治演变的一大特征。^①一些武装组织借助自身与域内强国或域外大国建立的紧密联系,在地区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②在此背景下,非政府武装组织(后文简称为“武装组织”)的产生、行为及影响等问题获得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般认为,武装组织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长期战乱、政府统治薄弱,以及政治思潮变化等。近代以来,一直充斥着战争与变革的中东自然就成为了武装组织高度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许多国家爆发大范围反政府抗议乃至内战冲突,导致中央政府权威坍塌,削弱了其在包括政治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的掌控和协调能力,武装组织也由此迅速扩散,其中一些形成割据的组织甚至完全取代了中央政府在部分区域的职能,深度参与到了整个地区的安全和政治事务之中。^③因此,中东地区的一些割据武装可以被视为具有一定自主性与地区影响力、能做出重要安全战略选择的政治行为体。

当武装组织与域内或域外国家存在受援和援助关系时,二者间便具有了一定的委托—代理关系结构。然而,在面临与委托方发生较为严重的路线分歧时,不同武装组织做出的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差异。例如,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都曾与其主要援助国产生了战略上的明显分歧,但前者选择了继续追随,而后者却选择背离并且与委托方国家的对立阵营展开了合作。为什么同处中东地区的武装组织在面临委托—代理关系分歧时会选择不同的策略?武装组织内部的决策机制逻辑又是什么?本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期更加系统和深入地理解武装组织的行为选择。

^① May Darwich,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Armed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Less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7, No. 4, 2021, p. 2.

^② 例如,黎巴嫩的真主党组织经历了从非法武装组织向国内合法政党的转变,并且一直和伊朗有着紧密的联系,现在在黎巴嫩国内外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受到大量来自美国的资助,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和叙利亚内部政治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③ 吴冰冰:《中东战略格局与变化世界中的中东》,《世界知识》2021年第3期,第14~17页。

二、文献综述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武装组织在面临委托—代理关系产生分歧时会选择不同的策略。现有文献没有充分关照武装组织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复杂性。有的学者倾向于将武装组织看作“整合性的行为体”,对其内部的安全合作考量与运作机制缺乏系统性的研究。^①并且,围绕武装组织的策略制定机制问题,国内外学界尚未提出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单一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中。尽管目前从武装组织的角度出发,思考产生分歧后委托—代理关系变化的文献较少,但是从国家或其他视角分析委托—代理关系为何会产生分歧,以及为何会产生不同走向的文献较多。因此,本文将对不同层面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期提供一个全面的研究框架。

对于委托—代理关系在发生分歧的情况下为何有时会破裂有时却不会,目前存在以下四类解释路径:第一大类是“内部因素论”,此类解释从武装组织的内部因素出发,认为武装组织的内部变化以及其管辖地区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其与委托方之间的关系。例如,有学者认为,2012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退出伊朗—叙利亚联盟是其内部不同政治派别斗争的结果。2015年哈马斯的政策回转则是为了自身政权的稳固性和合法性,是考虑到巴勒斯坦社会对叙利亚内战的民意发生了转变,哈马斯才决定返回伊朗—叙利亚联盟。^②此外,关于武装组织间结盟的研究也发现,内部因素如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也是武装组织选择合作对象的重要考量。^③此路径考虑到了武装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但是相关研究仍然较为分散,没有对内部因素做出归类,且较多使用单一案例进行分析,相关结论缺乏说服力。同时,武装间结盟的研究则多是集中在内战

① 周亦奇:《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4期,第129页。

② 赵星华:《哈马斯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官方文件为视角》,《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0页。

③ Laia Balcells, Chong Chen and Costantino Pischedda, “Do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Rebel Constituencies and Civil War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6, No. 1, 2022, p. 2; Emily Kalah Gade et al., “Networks of Cooperation: Rebel Alliances in Fragmented Civil War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3, No. 9, 2019, p. 2090.

研究领域,多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缺少对国家—武装组织间关系的理解,也没有分析武装组织政策制定的机制。

第二类是“第三方影响论”,此类解释认为国家决定改变甚至中止与武装组织的合作关系,可能是受到了地区内其他国家的影响。例如,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援助伊拉克库尔德人组织持观望态度,是因为担心对库尔德人的援助会动摇土耳其的政权稳定,同时也不想破坏同伊拉克政府的友好关系。^① 鉴于武装组织相比于国家行为体普遍缺少国际社会的认可,主权国家通常才是域外国家的地区战略支柱,因此地区内国家的不满可能会导致域外国家与该地区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然而,地区国家的态度是否是国家—武装组织间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需要深入探究和辨析。在一些案例中,即使没有其他地区国家的影响,国家—武装组织间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此类文献似乎暗示只要地区盟国表达不满,委托方国家就会终止与武装组织之间的关系,忽略了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此类博弈中的主动性。

第三类是基于委托方和代理方双边互动的“威胁认知论”。这一视角的主要观点是:地缘政治考量是国家行为体寻求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达成合作的主要原因。^② 国家行为体希望通过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达成委托—代理关系,向对手国家进行威慑或者破坏,在降低自身风险的情况下有效打击对手并提高自身的地区影响力。当武装组织和国家的共同威胁还存在的时候,即使两者之间存在分歧,两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不会破裂;而当国家行为体认为支持代理人会破坏其在该地区的安全或者经济利益时,则有可能会放弃这段关系。^③ 不过,

① 哈冠群:《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运动与美国外交政策(1961~1975)》,《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53页。

② Michael G. Findley and Tze Kwang Teo, “Rethinking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into Civil Wars: An Actor-Centr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8, No. 4, 2006, p. 828; Idean Salehyan,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David E. Cunningham, “Explaining External Support for Insurgent Group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 4, 2011, p. 720;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and the Future of Conflict,” *RUSI Journal*, Vol. 158, No. 2, 2013, p. 45; Daniel Byman, *Deadly Connections: States That Sponsor Terror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7.

③ Stephen Watts et al., “Proxy Warfare in Strategic Competition: State Motivations and Future Trends,”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A300/RRA307-2/RAND_RRA307-2.pdf.

尽管这一理论指出了武装组织对威胁的考量,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共同威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有的武装组织却退出了与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例如,2012年哈马斯就曾选择退出伊朗—叙利亚联盟。

第四类“利益分化论”也关注到了委托—代理的双边互动,并对“威胁认知论”进行了补充。这一视角强调委托方与代理方的威胁认知不需要完全一致,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优先打击目标。而当继续这段合作关系都不再符合双方的利益时,委托—代理关系会发生改变乃至破裂。委托方作为较为强势的一方,可能会向代理方施加压力迫使其做出让步。^①伊莱·伯尔曼和大卫·莱克研究发现,对委托方来说,与代理方合作的首要考量是双方利益与目标的一致性,当双方目标不一致时,委托方可以使用奖惩策略来控制代理方。^②委托方也会在一些情况下失去对代理方的控制,当委托方没有提供有效的激励或监督机制的时候,代理方就可能摆脱委托方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损害委托方的利益。^③此类理论扩充了导致武装组织—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的因素,但是没有对利益分化的具体情况做出区分。同时,相关研究也不自觉地倒向了委托方视角,关注的是委托方有效控制代理方的机制,对代理方的自主性关注不够。此类研究也需要对利益分化的程度做出进一步分类。例如,委托方与代理方为何会在一开始就存在利益分化之际展开合作;利益分化加剧到什么程度时,武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才会发生变化。

部分学者将“威胁认知”与“利益分化”进行了融合,指出威胁共识度和资源互补性是决定国家—武装组织间关系的两个主要变量,当委托方和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减低或者资源互补变弱时,双方的关系也会随之变弱甚至破裂。^④但是,鉴于委托方与代理方通常存在实力与身份的不平等,本文认为委托—代理关系

① 文少彪、刘中民:《双向博弈: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委托—代理关系(2014~2020年)》,《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第115页。

② Eli Berman, David A. Lake and Julia Macdonald, eds., *Proxy Wars: Suppressing Violence through Local Agen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4.

③ 文少彪、刘中民:《双向博弈: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委托—代理关系(2014~2020年)》,《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第120页。

④ 陈翔:《理解国际冲突中的庇护—代理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3期,第63页。

的变化需要进行分类讨论才更具有说服力。委托方选择中断委托—代理关系与代理方选择中断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情形,尽管结果相似却不可以归为一类。同时,当武装组织或者国家单方面认为出现利益分化时,双方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不同的演变方式也需要继续讨论。

从总体上看,既有研究中对武装组织自主行为的讨论尚不充分。无论是“威胁认知论”抑或“利益分化论”,它们主要关注的仍然是委托方控制代理方的机制,即为何有时委托方可以成功控制住代理方,有时却会丧失对后者的掌控,乃至被后者反噬。^① 凯·泰勒意识到了武装组织的自主性会影响到其与国家间的关系,他以“是否和委托国有直接的联络和利益输送”为依据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分为了“代理”“赞助”“自主”三种。^②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分析古巴在安哥拉内战中的能动性,发现代理方的自主性与其能力有关,代理方的军事能力和获得的资源越强,其自主性就会越大。^③ 而当代理方的自主性变大时,其在执行委托方的任务时就更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做出与委托方指令不符的举动。^④ 例如,古巴在安哥拉的行动就并非完全按照苏联的指示,而是根据自身利益和对局势的判断进行的。^⑤ 然而,现有研究对武装组织自主行为的分类和机制的讨论并不充足,没有解释武装组织的自主行为为何以及如何主动改变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古巴在安哥拉的行为属于国家行为体作为代理方的案例,无法与武装组织作为代理方的案例直接进行类比。

目前学界对于“委托—代理关系为何在分歧后产生不同走向”的研究较为繁

① 文少彪、刘中民:《双向博弈: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委托—代理关系(2014~2020年)》,《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第117页; Daniel Byman and Sarah E. Kreps. “Agents of Destruction? Applying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to State-Sponsored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11, No. 1, 2010, p. 1; Eric Ritteringer, “Arming the Other: American Small Wars, Local Proxi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2, 2017, p. 396.

② Kai M. Thaler, “Delegation, Sponsorship, and Autonomy: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rmed Group - St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7, No. 1, 2021, p. 2.

③ Piero Gleijeses, “Moscow’s Proxy? Cuba and Africa 1975 - 1988,”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8, No. 4, 2006, p. 103.

④ Berthold Unfried, “Internationalism, Cooperation and Personal Entanglements between Cuba,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nd Angola in the Socialist World,” *Cold War History*, 2024, pp. 5~6.

⑤ Piero Gleijeses, “Cuba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Namibia,” *Cold War History*, Vol. 7, No. 2, 2007, p. 292.

杂。一些研究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对单一案例进行描述和分析,虽然有助于深化对具体案例的理解,但视角较为片面,缺乏对不同情形的归类以及对武装组织行为策略的系统性分类,不能清晰地反映武装组织—国家间关系发生变化背后的博弈机制。^①在充分梳理现有的相关解释后,本文针对既有委托—代理关系理论框架的不足进行了改进和补充,并以此为基础来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上所述,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已经从最初基本完全忽略代理方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发展到开始关注代理方的利益考量,并尝试综合分析委托方和代理方双向博弈的研究阶段。然而,这类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往往没有锚定委托方,而是单纯指出委托与代理方双方的策略改变会共同导致关系的变化。本文认为在分析相关案例时,应该要锚定委托方的动向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代理方的考量因素。

接下来本文将先对武装组织的行为策略加以区分,以便系统地理解其策略选择,然后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将武装组织的内部考量因素加入框架中,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回答为什么武装组织在与国家产生分歧时会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从而试图从武装组织的角度理解其在与国家行为体互动过程中的策略制定机制。

三、理论分析框架

(一) 理论前提与范围澄清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有着较为固定领地的武装组织,属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中的一类,不包括领土规模变化迅速的游寇、恐怖组织或流亡武装等。该类武装组织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控制着较为固定的领地,拥有足以保卫其领地的军事力量,且在该领地上还具有发挥政府职能的意愿和能力,维护控制领地的社会治安

^① 文少彪,刘中民:《双向博弈: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委托—代理关系(2014~2020年)》,《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第120页;Eli Berman, David A. Lake and Julia Macdonald, eds., *Proxy Wars: Suppressing Violence through Local Agen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4; Yoel Guzansky and Zachary A. Marshall, "Outsourcing 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8, No. 2, 2023, p. 330.

并提供社会服务,如建立学校、广播站和法庭等。^① 该类武装组织以在国内的斗争中获胜为最终目标,因此需要在策略选择时考虑自身的综合实力变化。相反,没有固定领土的武装组织在多数情况下完全依赖域外国家的支持,难以在本土内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通常也缺乏足够的政策考量空间。因此,本文只将有固定领土的武装组织纳入分析中,且不考虑委托方国家抛弃武装组织的情境。

武装组织和委托方国家之间产生分歧是本文理论框架的前提。本文所指的分歧是:当委托方国家改变了原有的地区策略,导致武装组织与委托方国家出现了战略差异的情况。当委托方的地区政策对代理方的利益造成冲击,但并未直接断绝双方的合作关系时,可以视为双方产生了分歧。

在上述情景下,武装组织面临着继续追随委托方国家还是继续原有地区政策的两难选择。当委托方国家改变了原有的地区政策时,其与武装组织之间的威胁认知会变得不统一,某一方乃至双方都可能对现有的资源交易模式表示不满,分歧也就随之产生。但是,即便产生了分歧,也只有当委托方国家仍然没有放弃这段合作关系时,武装组织才会拥有策略调整的空间。此外,本文假定武装组织为理性行为体,会在衡量客观事实后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考量。

本文选取案例的范围落在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具有复杂的地缘政治动态和权力斗争关系,地区和域外大国至今仍然在该地区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东地区的案例非常适合用于研究国家—武装组织间关系的变化。在具体案例的选取上,本文按照上述的案例筛选准则,选取了委托—代理关系变化最鲜明,分歧产生最易观测,且事实资料相对充足的相关案例。

(二) 因变量分类

本文将武装组织在和委托方国家出现分歧时做出的不同策略视为因变量。结合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武装组织在与委托方国家产生分歧时的可选策略有四

^① Reyko Huang and Patricia L. Sullivan, "Arms for Education? External Support and Rebel Social Servi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8, No. 4, 2021, p. 795.

类,分别是“追随”“背离”“退出”和“抗议”。^①

武装组织的策略可以从两个重要的维度观测,即考察是否存在“反叛行为”和“反对表态”。武装组织可能存在的行为有三种,分别是“加入对手阵营”“中立”和“留在原阵营”。当委托方实行新的地区政策,武装组织并不追随而是做出“加入对手阵营”和“中立”两种行为时,不管武装组织是否公开表示不满,都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身的态度,因此本文将以上两种政策行为均视为“反叛行为”。反对表态指的是公开表达对现状的反对态度,包括组织成员游行、发表官方谴责声明等。结合以上两个组成要素,可以对武装组织的四种策略做出更系统且详细的区分(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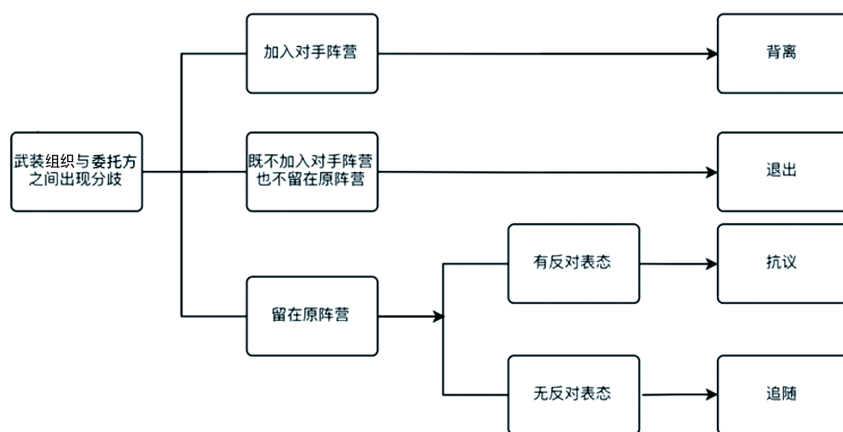


图1 武装组织与委托方产生分歧时的策略类型区分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① 达尔维什在研究2011年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切断与伊朗阵营的关系时使用的词汇是 withdraw, 本文借鉴这一用词, 将其直译为“退出”作为武装组织采取的合作政策的一种。此处的“追随”不同于联盟研究中的传统的“追随”行为, 后者与“制衡”是一对反义词。孙德刚将中东地区的联盟模式分为了四种, 其中的“弱链式联盟”包括具有“准国家”性质的武装行为体。孙德刚在文中指出, 弱链式联盟的成员超越了零和博弈思维, 强调结盟并非一味地制衡或追随。本文借鉴上述用词用法, 将武装组织跟随委托方国家的新政策的做法称为“追随”。参见 May Darwich,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nd Armed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Lessons from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7, No. 4, 2021; May Darwich, “Alliance Politics in the Post-2011 Middle East: Advanc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6, No. 5, 2021, pp. 635 ~ 656; 孙德刚、凌胜利:《多元一体: 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期, 第46 ~ 75页。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本文认为完全背叛委托方的情况在现实情境中比较少见,因为武装组织在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身份和综合实力通常都要远小于国家行为体,与作为国家行为体和地区政治强势一方的委托国决裂会对武装组织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对“背离”策略的定义为:武装组织选择和委托方的对手阵营联络、合作甚至加入对方阵营的情况。这也是四种政策选择中对委托方反对程度最强的一种。

“退出”指的是武装组织选择退出现委托方及其阵营,但同时也不加入委托方的对手阵营或者与其联络合作,而是秉持相对中立的情景。“是否加入委托方的地区对手阵营”以及“是否退出现有委托方的阵营”是测量“背离”和“退出”两种情况的指标。做出“背离”或“退出”政策的武装组织,不管其官方表态如何,已经明确彰显了其对现有委托方政策的不满,因此不需要再判断其有无反对表态。

当武装组织选择继续留在原阵营时,是否公开表达反对态度就成为界定其行为性质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指标。“抗议”指的是武装组织表达了反对态度,但是在官方层面仍留在原阵营的情景。在此类情况下,武装组织明确表达了其并不完全认同委托方国家相关政策的态度,希望委托方国家做出改变。武装组织会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或组织群众游行等,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最后一种“追随”策略指的是武装组织在继续追随委托方国家的同时也不公开表达反对态度的情况。

(三) 与委托方发生分歧时影响武装组织策略选择的因素

武装组织提升或者巩固自身综合实力的两个主要途径分别是“外部支持”和“社会支持”。域外大国作为武装组织的委托方可以提供资金、武器、人员培训,乃至直接提供兵力援助,如美国曾直接增派空军协助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组织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外部支持”可以直接快速地提升武装组织的作战能力,武装组织也因此可以更好地夺取或者保卫已有的领地和权力,并且更有可能在其国内的斗争中获取胜利。^①至于“社会支持”,现有研究认为,武装组织行使

^① Reyko Huang and Patricia L. Sullivan, “Arms for Education? External Support and Rebel Social Servi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8, No. 4, 2021, p. 795.

管理职能是在与其控制领地内的社会达成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契约:武装组织给当地居民提供社会服务、建立秩序与安全机制,代替中央政府行使一定的管理职能;而居民们则向武装组织效忠,给武装组织提供资金、粮食、武器、民兵等资源以对抗武装组织在国内权力竞争中的对手。^①

虽然,“外部支持”和“社会支持”两种要素都可以提升武装组织的综合实力,但是两者造成的效果却各有侧重(见图2)。“外部支持”主要提升的是武装组织的“军事实力”,对武装组织有即时的影响;“社会支持”提升的是“军事潜力”,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理念因素,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思想,通常是武装组织用来增强社会支持率的重要手段之一,另一个重要手段则是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② 当其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强时,武装组织可以更好地使用理念因素和提供社会服务这两种方式从心理和物理层面动员控制领地的居民,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增强自身的军事潜力,获得更多的军事资源。^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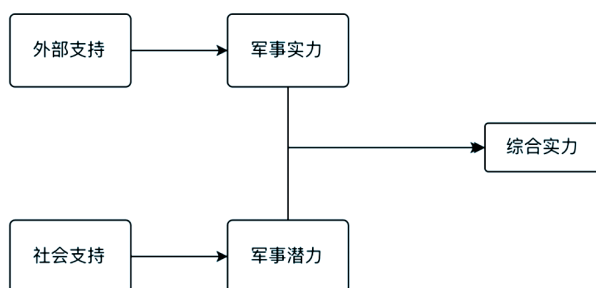


图2 “外部支持”和“社会支持”对武装组织的影响逻辑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对于武装组织来说,其在国内尚未取得全部且合法的控制权,在国际体系中

① Reyko Huang and Patricia L. Sullivan, “Arms for Education? External Support and Rebel Social Servi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8, No. 4, 2021, p. 797.

② Ana Arjona, *Rebelocracy: Social Order in the Colombia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9.

③ Reyko Huang and Patricia L. Sullivan, “Arms for Education? External Support and Rebel Social Servi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8, No. 4, 2021, p. 798.

也不是合法且正式的参与者,其地位是浮动且不确定的,既需要巩固自身的军事实力,也需要确保自身的军事潜力,以此来保证自己能够继续生存并在地区扮演一定的角色。本文据此认为武装组织的利益考量主要分为两部分:即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潜力”。现有研究对“军事实力”是否会提升“军事潜力”存在争议。从逻辑角度分析,当武装组织从外部支持中获得了更多的武器、资金和兵力时,其应更有能力去提供社会服务,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当武装组织从域外国家那里获得了足够的支持时,就没有动力去提供社会服务以获得居民支持了。尽管“军事实力”和“军事潜力”可能会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但是这两者的主要获取来源是不同的,对武装组织实力的影响也是具有差异的,因此这两者应该分开测量,且可以共同作为自变量搭建分析框架。

1. 变量一: 军事实力

武装组织的军事实力强弱会直接影响到其存续,当军事实力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武装组织可能会丧失与对手对抗或者争夺地区权力的能力,因此也就面临着重大生存威胁。只有当军事实力下降的程度不至于威胁生存时,武装组织才有空间进行战略选择。衡量军事实力变化的方法包括分析武装组织的武器和资金来源、和对手的实力差距、以及冲突的事实情况等。如对手实力远超武装组织,那么一旦武装组织丧失主要的资助来源则会不敌对手,导致自身灭亡。

本文通过分析事实案例,筛选出了三个主要的测量指标,分别是武器储备、兵员素质和资金支持(见表1)。(1)武器储备指的是武装组织存有的武器数量以及委托方承诺给予的武器援助。当委托方因为改变地区政策而减少武器援助,或者武装组织需要参与作战而消耗现有的武器储备时,武器储备可以看作被削弱,军事能力随之下降。(2)兵员素质指的是武装组织现有的作战兵力以及兵员质量。当委托方给武装组织的士兵提供训练时,兵员素质可以被视为得到增强;当委托方要求武装组织参与作战时,兵员素质被视为被削弱,武装组织的军事实力也随之下降。(3)资金支持关系到委托方给予武装组织的资金量。当委托方决定减少对该地区的投入从而减少对武装组织的资金支持,或者委托方需要增大对其他国家或武装组织的支持而减少对武装组织的资助时,都可以被视

为削弱了资金支持,武装组织的军事实力也随之下降。当委托方的地区政策影响到任一指标时,武装组织的军事实力均可以看作被削弱。

表 1 军事实力自变量测量指标

自变量	定义	测量指标	判断规则
外部支持 军事实力	对抗以及守卫既有政治资产的能力	武器储备	是否会消耗现有的武器储备或者域外国家是否会减少武器支持
		兵员素质	是否会提供充分的军事训练
		资金支持	是否会减少现有的资金支持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2. 变量二: 军事潜力

军事潜力指的是武装组织从控制领地的平民处获得兵力、物资和庇护所等军事资源的潜在能力。军事潜力的强弱通常受到社会支持的影响,若社会支持度降低,则武装组织也就难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获得更多的物资和兵力。判断社会支持高低的两个主要指标分别是“理念宣传力”和“社会服务供给力”,当这两个指标都增强时,武装组织就可以更充分地获取社会支持,其军事潜力也就越强,反则反之(见表 2)。

表 2 军事潜力自变量测量指标

自变量	定义	测量指标	判断规则
军事潜力	武装组织从控制领地的平民处获得兵力、物资和庇护所等的潜在能力	理念宣传力	是否会影响到武装组织动员平民所用叙事的合法性
		社会服务供给力	是否会削弱武装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与合法性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1)理念宣传力:平民可能会因为对中央政府的怨恨、对身份被边缘化的不

满,或者对武装组织意识形态的认同等观念因素支持武装组织。^① 当武装组织在控制领地内的叙事合法性遭到动摇,如委托方的新地区政策和武装组织宣传的意识形态对立时,或者当武装组织丧失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的能力时,“理念宣传力”都可以视为被削弱,武装组织的军事潜力也随之下降。(2) 社会服务供给力:指的是武装组织在控制地区行使一些政府职能,包括提供安全机制和社会服务体系等,从而增强对该地区的掌控力并获得该地区平民的认同的能力。当武装组织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时,可以视为其“社会服务供给力”下降,武装组织的军事潜力也随之下降。当委托方的新地区政策影响到以上两个指标中的任意一个时,武装组织的军事潜力均可看作被削弱。

(四) 中间机制

当委托方实行新的地区政策从而触动到武装组织的利益时,武装组织会先考虑如何应对生存威胁以及军事实力的变化,之后才会考量自身军事潜力是否会发生变化,并结合两个维度的考量结果决定采取何种对策(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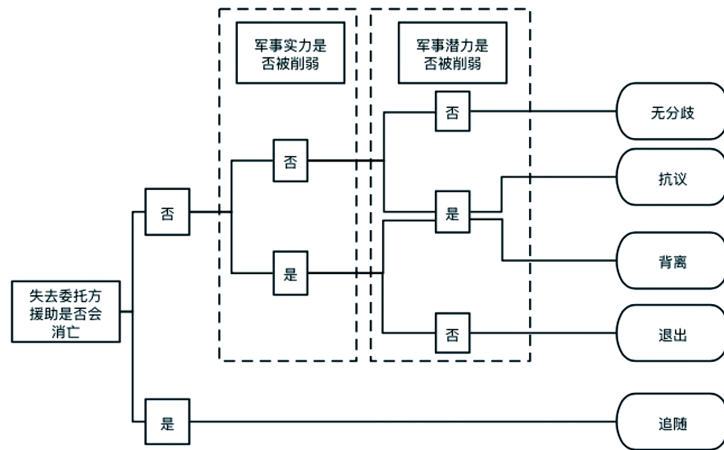


图3 武装组织与委托方产生分歧时的策略选择机制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① Reyko Huang and Patricia L. Sullivan, “Arms for Education? External Support and Rebel Social Servic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8, No. 4, 2021, p. 795.

首先,武装组织会考虑放弃追随是否会影响到自身的生存。例如,大幅损失军事力量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找到其他替代来源。只有在确定放弃追随并不会导致该组织消亡时,武装组织才会进一步考虑继续追随是否会导致军事实力以及地区军事潜力的下降。

假如委托方的新政策会削弱武装组织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潜力,则武装组织短期内对抗国内对手的能力和长期内对管辖地区的控制能力都会下降,留在原阵营没有利益可得,因此武装组织会选择“背离”,即联络或加入委托方的对手阵营以止损。

假如委托方的新政策会削弱武装组织的军事实力,但是其军事潜力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武装组织会选择“退出”,即放弃继续追随委托方,但也不会加入到委托方的地区对手阵营。其原因是:首先,加入到委托方的地区对手阵营可能会影响到武装组织的军事潜力,如新委托方的对手阵营与自身的意识形态可能不符;其次,加入委托方对手阵营也许会进一步引起委托方的不满,甚至影响到武装组织自身的军事实力。所以武装组织会选择“退出”,也就是不追随委托方的新政策,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利益。

假如委托方的新政策会削弱代理方的军事潜力,但不会影响其军事实力,那么武装组织会选择“抗议”,即在行动上继续追随委托方的地区政策,但是用“抗议”的方式重申意识形态宣传,维持自身在控制地区的合法性和平民支持度,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其军事潜力。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委托方的新政策既没有削弱武装组织的军事实力也没有降低其军事潜力,则本文认定此时双方并未因为委托方的政策变化而产生严重分歧,所以这种情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四、案例分析

(一)1969年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和美国

1968年7月,以伊拉克前总理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再度发起政变,彻底结束了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的统治,贝克尔和他

的远房侄子萨达姆·侯赛因正式登上了伊拉克的政治舞台。复兴党二度执政后,迅速地肃清政敌并巩固了政权,同时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也一改上任政府的颓势,快速且强硬地夺回了在该地区的上风。^①在短暂地向伊拉克库尔德组织表达了和谈的意愿后,新上任的伊拉克政府在同年8月还是决定严厉镇压库尔德反对派。此外,复兴党政府还联合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试图推翻当时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实际控制者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并通过离间伊拉克库尔德组织的方式来达到削弱伊拉克库尔德政治力量的目的。

为了应对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攻击,库尔德民主党派人前往美国近东事务局,要求美国直接向库尔德民主党提供武器。^②在1968年复兴党政府上台之前,就有证据表明美国一直在通过伊朗和以色列给予伊拉克库尔德人组织资金和武器的支持,同时也默许甚至鼓励两国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1964年,库尔德民主党成员肖卡特·阿克拉维在开罗联系上了美国大使,要求通过第三国予以库尔德民主党支持以对抗伊拉克政府军。^③一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鼓励伊朗和以色列对伊拉克库尔德人予以支持。^④而美国的积极态度也正中伊朗和以色列的下怀。伊朗反对一切形式的伊拉克民族主义,一直在支持伊拉克库尔德组织对抗伊拉克政府。此外,伊朗国王巴列维也希望通过利用库尔德问题在伊拉克国内制造混乱,以削减伊拉克政府在阿拉伯河归属问题上的谈判筹码。^⑤以色列方面则希望库尔德人可以帮助他们转移伊拉克政府的注意力,不让后者也加入到打击以色列的队伍中。

然而,当库尔德民主党在面对来自伊拉克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向美国、伊朗和以色列要求更多的武器时,却未能成功。美国委婉地回绝了直接运输武器装备这一请求,仍然坚持库尔德民主党应继续向以色列和伊朗寻求帮助。与库尔德

① Douglas Litt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urds: A Cold War Stor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2, No. 4, 2010, pp. 69 ~ 70.

② Ibid., pp. 71 ~ 75.

③ DOS Telegram to Embassy Baghdad, 5 June 1964, in *FRUS, (1964 ~ 1968)*, Vol. XXI, p. 337.

④ Douglas Litt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urds: A Cold War Stor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2, No. 4, 2010, p. 71.

⑤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Iraq: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p. 22.

民主党代表一同前往的还有亚述人组织代表,在会面结束后,亚述人代表单独对美方表示,希望美国绝对不要同意伊拉克库尔德人建国自治,因为亚述人担心伊拉克库尔德人在获得权力后会对亚述人组织不利。^①

美国这次的暧昧表态意味着美方与库尔德民主党的战略目标有本质的区别。在 1969 年之前,尽管美方或明示或暗示地通过以色列和伊朗给予了库尔德民主党许多资助,但美国一直很谨慎,并没有亲自予以援助。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谨慎态度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美国不愿意因为库尔德问题阻碍与伊拉克政府的关系。在美国和伊拉克两国关系转向友好的背景下,美国不可能直接出面帮助库尔德民主党。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担心对库尔德人的援助会影响其地区盟友土耳其的政权稳定。^② 库尔德问题是中东四国的共同问题,其中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武装的暴力活动最为严重,如果美国对伊拉克的库尔德民主党予以明确的支持,那无疑是给整个中东地区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发出积极的信号,土耳其乃至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组织都可能会争相模仿,导致这两个国家内政不稳。

与此同时,库尔德民主党面临着重大的生存挑战,并且除了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国阵营外,其在 1969 年这一时间节点上不可能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苏联更加关注伊拉克共产党在伊拉克境内的发展状况,而与伊拉克有着领土争端的伊朗,以及刚刚建国不久的以色列是唯二两个可能的资助方,而这两个国家的资源全部来源于美国。复兴党政府大力打击国内的异见组织,且其还扶持另一个伊拉克库尔德组织——库尔德爱国主义组织,极大地挑战了库尔德民主党在伊拉克国内的地位。因此,美国方面和库尔德民主党在战略目标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库尔德民主党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控制受到了来自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爱国主义组织的挑战,面临着重大的生存威胁,因此希望美方提供更多的武器,表现更明确的支持态度。然而,美方既不认为伊拉克政府是重大威胁,也不想给库尔德民主党提供更多援助,更没有明确支持库尔德民主党政治诉求的

^① Seely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3 June 1969, in *FRUS*, (1969 ~ 1976), Vol. E-4, Item 259.

^② *Ibid.*

计划。

尽管美国与库尔德民主党之间明显产生了战略分歧,后者却并没能实现他们威胁要执行的计划。库尔德民主党甚至做出了更大的退让,在1970年3月和伊拉克中央政府签署协议,承诺将在1974年交付所有武器,而并没有像当初库尔德民主党代表所说的那样要和伊拉克政府继续加强对抗。^①库尔德民主党和美国的关系仍然维持,前者仍然在接收来自伊朗和以色列的援助,并通过两国与美方进行联系。总之,库尔德民主党与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战略分歧而破裂,且库尔德民主党也放弃了原有的激进抗争的计划,并没有做出违背美国地区利益的行为。

上述行为符合本文理论框架中的“追随”结果,即当委托方的地区政策损害武装组织的自身利益时,其仍然没有执行自己的地区政策,没有联系美国的对手苏联阵营,而是继续跟随委托方。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库尔德民主党腹背受敌,既遭受到来自新任伊拉克政府的镇压,又面临着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夺权威胁。并且,库尔德民主党的主要外部援助一直来自美国主导的阵营,如果这时因为忤逆美国而被后者切断援助,则库尔德民主党很有可能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库尔德民主党方面对美非常不满,也只能选择不反叛,而是继续追随美国并放弃原有的激烈斗争策略。

(二)2018年“叙利亚民主力量”和美国

库尔德人是叙利亚的第二大民族,其公民权利一直遭到叙利亚当局的压制,叙利亚历史上颁布了一系列的阿拉伯化法令对库尔德人进行强制同化,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上台后更是对库尔德人采取了更激进的同化和歧视政策。截至2011年,超过十分之一的库尔德人没有叙利亚公民身份。^②

2011年中东变局爆发时,叙利亚库尔德人并没有以统一的步调加入到反政府的阵营中。面对席卷全国的反政府游行,大部分叙利亚库尔德政党都秉持观

^① Seely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3 June 1969, in *FRUS*, (1969 ~ 1976), Vol. E-4, Item 259.

^② Thomas Schmidinger, *Rojava: Revolution, War and the Future of Syria's Kurds*, London: Pluto Press, 2018, p. 62.

望的态度。^①

直到 2012 年,叙利亚库尔德人才正式卷入到了叙利亚内战中。在艾因角战役中,当叙利亚政府军和“叙利亚自由军”交火时,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趁机占领了当地的政府部门。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随后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多次交火,并驱散了多个地方的“圣战”分子。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在战斗中的表现为其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作为其政治组织也成为了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此外,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还赢得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支持,成为了西方在叙利亚的关键合作伙伴。^②

2015 年 10 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军事同盟在美国的资助下成立,其在军事上完全由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领导。美国是“叙利亚民主力量”最重要的合作国家,为了对抗“伊斯兰国”和叙利亚政府军,美国不仅给“叙利亚民主力量”提供了大量武器,还直接以空军支援其作战。尽管美国名义上是给“叙利亚民主力量”输送武器,但事实上这些武器的主要受益者是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因此可以将美国的援助视为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直接资助,将美国视为其主要赞助者。^③ 美国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军事及政治合作变得愈发紧密,前者依赖后者在反恐战争中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在后者的帮助下击溃了“伊斯兰国”。

“叙利亚民主力量”与美国的分歧源于前者的政治诉求。2016 年 12 月,“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叙利亚库尔德地区重申了对区域自治的诉求。叙利亚主要的库尔德政党,库尔德民主党联盟的主要诉求是:(1) 对其控制下的库尔德人和非库尔德人社区实行“民主自治”;(2) 获得对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边界的控制。^④ 这两个政治目标表明,叙利亚库尔德人希望实行对内的自治权以及自保权,巩固对既有土地的控制权,并希望使自身合法化并取得更多的国际支持。此

① Vittoria Federici, “The Rise of Rojava: Kurdish Autonomy in the Syrian Conflict,”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5, No. 2, 2015, pp. 81 ~ 90.

② Spyridon Plakoudas, “The Syrian Kurds and the Democratic Union Party: The Outsider in the Syrian War,”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8, 2017, p. 105.

③ Thomas Schmidinger, *Rojava: Revolution, War and the Future of Syria's Kurds*, London: Pluto Press, 2018, p. 106.

④ May Darwich, “Alliance Politics in the Post-2011 Middle East: Advanc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6, No. 5, 2021, p. 648.

举使联合国支持的正在进行的叙利亚和平谈判更加艰难,而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联盟并未被邀请参与此次和平谈判。^①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诉求还引起了叙利亚政府、邻国土耳其和美国的反对和抗议。

美国的表态主要是为了平衡其与土耳其和“叙利亚民主力量”间的关系。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势力日益壮大愈发不满。从2017年到2020年,土耳其为了将叙利亚库尔德组织驱离土叙边境地区发起了多次军事入侵行动,而美国并未出手阻止。随着叙利亚的地区局势变得愈发复杂,为了能够对抗土耳其的入侵并实现自身的自治目标,“叙利亚民主力量”开始主动寻求与美国的地区对手展开合作。2017年9月,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的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布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愿意与叙利亚政府合作,以换取在叙利亚建立联邦制以及政府对叙北部地区自治的承认。^② 同时,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还转向俄罗斯寻求军事和外交的帮助,以便达成和叙利亚政府的临时合作甚至和解协议。^③

叙利亚库尔德组织和美国之间关系变化的案例符合“背离”策略的定义。尽管叙利亚库尔德军仍然在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但是前者与后者的地区对手俄罗斯阵营联系甚至合作,此行为已经可以看作是“背离”。叙利亚库尔德组织在获得外部援助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军事能力,且在长期的战争中获得了一定的武器存量,因此,即使美国完全撤军,也不会直接影响其生存。但是,如果其继续追随美国,叙利亚库尔德组织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潜力都会受到影响。首先,美国在土耳其打击叙利亚库尔德组织的行动中保持冷漠,叙利亚库尔德组织在遭到土耳其的军事打击时得不到援助,也无法获得建立自治区的支持,武器储备和资金支持都被削弱,其军事实力一定会下降。此外,土耳其将叙利亚库尔德组织从所控制领地驱离,也导致其控制的领地减少,破坏了其原先建立的社会服务体系。继续追随不支持建立库尔德自治的美国,也对叙利亚库尔德组织的意识

① 文少彪、刘中民:《双向博弈: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委托—代理关系(2014~2020年)》,《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第130页。

② “Syrian Kurdish Commander: We’re ‘Ready to Engage’ with Damascus,”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17/09/turkey-kurdish-commander-says-us-should-stay-in-syria.html>.

③ 文少彪、刘中民:《双向博弈:美国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委托—代理关系(2014~2020年)》,《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第136页。

形态宣传和动员不利,进而会破坏其军事潜力。因此,在对比继续追随和放弃追随的成本收益之后,叙利亚库尔德组织选择了放弃追随美国,转而和美国的对抗阵营联系。

(三)2011 年哈马斯和伊朗

哈马斯从建立伊始就一直未能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哈马斯一直希望通过参加巴勒斯坦议会选举而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在 2006 年赢得了巴勒斯坦选举后,哈马斯开始以合法身份正式参与到巴勒斯坦的政治进程中。不过,哈马斯的胜选并没有使其在西方国家眼中的身份发生转变。在赢得选举并与法塔赫组织发生冲突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反而遭受封锁,由美国主导的四方机制对哈马斯实行经济制裁,暂停了对巴勒斯坦政府的所有经济援助和外交接触。^① 哈马斯的主要经济和军备一直来源于伊朗和叙利亚联盟。对于叙利亚来说,支持哈马斯可以表明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态度,提升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位和声望。伊朗则视哈马斯为可以袭击以色列的地区代理人。伊朗与自己利用意识形态相同的哈马斯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提升自身的地区政治地位,并表明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叙利亚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公开支持哈马斯的国家,且伊朗和叙利亚每年都是哈马斯最大的资助方。尽管哈马斯一直拒绝公开财政收入,但根据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估算,伊朗每年向哈马斯提供的补贴总额约为 1 亿美元,占哈马斯 2010 年公布的财政预算的 20%。^②

伊朗、叙利亚和哈马斯之间的紧密联盟关系在 2011 年发生了变化。是年叙利亚国内爆发危机,哈马斯却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支持叙利亚政府。与之相比,黎巴嫩真主党组织则积极表态,公开支持叙利亚政府,甚至派遣军队与叙政府军一起作战。^③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伊始,哈马斯就曾经委婉地表达了对叙利亚抗议者的支持。当大马士革的难民营发生多起爆炸后,哈马斯的官方网站发表

① 赵星华:《哈马斯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官方文件为视角》,《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110 页。

② “Gaza’s Economy: How Hamas Stays in Power,”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gazas-economy-how-hamas-stays-power>.

③ May Darwich, “Alliance Politics in the Post-2011 Middle East: Advanc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6, No. 5, 2021, p. 643.

声明称,支持叙利亚人民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现有的危机。^① 2012年2月,当时的哈马斯政府宣布该组织总部离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这一声明意味着哈马斯正式退出伊朗—叙利亚联盟。^② 虽然哈马斯组织态度鲜明地支持叙利亚抗议者,但自始至终其官方声明与文件中都未对叙利亚政府表示过谴责。尽管如此,哈马斯的暧昧表态与明确的退出联盟举动还是激怒了伊朗和叙利亚,伊朗有意要减少甚至完全切断对哈马斯的援助。^③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和叙利亚的撤资对哈马斯的影响也许并没有想象中严重。哈马斯的资金来源繁杂,尽管伊朗的资助占据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失去这项资金支持并不会影响哈马斯组织的存亡。^④ 控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当局以及国际组织每年也给哈马斯输送大量资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2009年的人均GDP约为1400美元,而这些收入并不来自生产型经济活动,而是大部分由巴勒斯坦当局支付。^⑤ 哈马斯完全掌控加沙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每年通过800多条地下隧道与埃及进行大量的走私贸易,预计年收入高达6至8.5亿美元。^⑥ 相反,如果哈马斯组织继续追随原委托者,则可能被要求给予叙利亚政府军事援助。同时,鉴于当时叙利亚战局不明朗,伊朗和叙利亚也很有可能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留给战场,哈马斯从伊朗阵营获得的武器和资金也就会因此下降。

综上,哈马斯在2011年退出该阵营的行动符合前文提出的“退出”策略。哈马斯不赞同伊朗和叙利亚的战略政策,同时因为哈马斯此时与以色列的对抗关系相对缓和,所以放弃追随原阵营也并不会使自己面临即时性的生存威胁。此

① Napolitano Valentina, “ Hamas and the Syrian Uprising: A Difficult Choice,” *Middle East Policy*, No. 3, 2013, p. 78.

② May Darwich, “ Alliance Politics in the Post-2011 Middle East: Advanc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6, No. 5, 2021, p. 643.

③ “ Foreign Funds for Hamas Hit by Syria Unrest: Diplomat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77K191/>.

④ Hadeel Al Sayegh et al., “ Who Funds Hamas? A Global Network of Crypto, Cash and Charitie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hamas-cash-to-crypto-global-finance-maze-israels-sights-2023-10-16/>.

⑤ “ Gaza’s Economy: How Hamas Stays in Power,”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gazas-economy-how-hamas-stays-power>.

⑥ Ibid.

外,因为哈马斯并不是处于战争之中,其生存并没有面临即时威胁。此外,假如哈马斯不继续追随伊朗阵营,其军事潜力也并不会下降。首先,哈马斯和伊朗在许多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看法相近,即便两者的宗教派系不同,但是双方在反对以色列这一问题上高度一致。第二,哈马斯对领地的掌控较为稳固,其在2006年之前就已经控制加沙地区,哈马斯的兵员来源因此比较稳定,军事潜力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继续追随伊朗和叙利亚阵营,则有可能被卷入叙利亚内战中,造成现有的军事实力的损失。因此,在对比继续追随和放弃追随两个情景下的成本收益之后,哈马斯组织选择了“退出”,即在实际行为中退出了伊朗阵营的行动,却也没有站到伊朗阵营的对立面。

(四)1993年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

自1989年开始,黎巴嫩进入了“叙利亚治下的和平”时代,叙利亚在该地区开始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黎巴嫩内战结束后,和真主党有着更为紧密联系的伊朗也在同年经历了领导层的变动,随着霍梅尼去世,新上任的伊朗领导人开始更加关注伊朗国内事务,并同意将黎巴嫩地区的部分权力让渡给叙利亚。^① 尽管《塔伊夫协议》呼吁缴械国内所有的民兵武装,但叙利亚还是保留了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武装,以便在该地区继续对抗以色列军。^② 真主党自此成为黎巴嫩国内唯一合法持有武器的武装组织,其国内地位得以进一步稳固并壮大。事实证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真主党在叙利亚与以色列的各类谈判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以叙发生矛盾时代替叙利亚部队在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对抗,有效地减少了叙利亚本国部队面临的风险。^③ 叙利亚和真主党的关系在1990年之后迅速变得更紧密,叙利亚和伊朗也一直在给真主党输送武器和资金。

① 李福泉:《黎巴嫩真主党政治参与解析》,《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4期,第48页。

② Mohamad Hage Ali, “Power Points Defining the Syria-Hezbollah Relationship,” https://carnegie-production-assets.s3.amazonaws.com/static/files/Hage_Ali_Hezbollah_final1.pdf, p. 8; Abbas William Samii, “A Stable Structure on Shifting Sands: Assessing the Hizbullah-Iran-Syria Relationship,”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1, 2008, p. 40.

③ 例如,1993年7月,真主党在以色列炮袭黎巴嫩南部后向以色列发射了喀秋莎火箭弹,以色列作为报复空袭了叙利亚在贝卡谷地的阵地,并驱逐了黎巴嫩南部村庄的村民。最终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才结束了这次的对抗。参见 Flynt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Bashar's Trivial by Fir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 239。

此外,在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也逐步转型,从宣传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武装组织转变为了以反以色列思想为宣传重点的黎巴嫩政党。黎巴嫩在1992年开展了第一次大选,真主党也因为其反以抵抗运动在黎巴嫩国内乃至阿拉伯世界都获得广泛的赞誉,一跃成为了黎巴嫩的主流政党。真主党的官方电视台“灯塔电视台”也在1991年6月发出了第一条新闻播报,该电视台在伊朗的资助下迅速发展成为了一个综合电视台。真主党将该电视台称为“抵抗电视台”,明确彰显了其“以色列抵抗者”的政治地位,利用这一名号将该电视台覆盖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其如今的影响力仅次于半岛电视台。^①除了开设官方电视台以外,在内战结束的两年时间里,真主党还掌握了多家电视台和广播站,并且开设了两家设施完备的医院,具有充足的动员工具和能力。^②综上,内战结束后,“对抗以色列”是真主党的主要优势与宣传话术,只要以色列与叙利亚的矛盾没有完全解决,叙利亚就仍然需要真主党作为代理人在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对抗。而只要以色列对黎巴嫩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仍然存在,那么真主党就可以继续利用反以叙事赢取更多人的支持。

真主党与叙利亚的分歧源于叙利亚决定参与巴以和谈。1990年末,叙利亚开始和以色列进行谈判,哈菲兹·阿萨德称这次谈判是在追求“真正的和平”,而不是“政治游戏或者陷阱”。^③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激化了叙利亚和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叙利亚此时对巴以和谈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叙利亚同意对以色列让步,那么真主党“反以战士”的身份就会被削弱,其在阿拉伯世界乃至黎巴嫩国内的支持率会受到影响,其政治地位也会因此下降。因此,如果叙利亚对《奥斯陆协议》表示赞同,那么真主党在国内的军事潜力可能会立即受到影响,话语权会大幅降低。

1993年9月,上百名亲真主党人士上街抗议《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叙利亚控

① “Al-Manar: Hizbullah TV, 24/7,”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al-manar-hizbullah-tv-247>.

② Anoushiravan Ehteshami and Raymond A. Hinnebusch, *Syria and Iran: Middle Powers in a Penetrated Regional Syst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46.

③ “How Palestinians Can Achieve A Real ‘Peace of the Brave’,”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how-palestinians-can-achieve-real-peace-brave>.

制的黎巴嫩政府军对其进行暴力镇压,9名抗议者被射杀。^① 尽管此事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民众抗议,但是抗议的重点已经转向了黎巴嫩政府暴力执法,反对巴以和谈的抗议被暂时平定了下来。更重要的是,真主党并未对黎巴嫩政府军的暴力执法表示激烈反对。真主党领导人表示,这次的暴力镇压是在试图挑衅真主党,迫使其采取武力,然而真主党会保持克制。^② 这件事意味着叙利亚和真主党开始产生重大分歧,但是因为以色列与叙利亚停火谈判最后归于失败,真主党与叙利亚之间的矛盾最终并未激化。

真主党的上述行为属于武装组织官方并未做出反叛,却动员其成员发动自发抗议,表达对分歧的不满,试图给委托方国家输送反对的信号,属于本文提出的“抗议”策略。叙利亚改变了之前的政策,开始考虑与以色列讲和。这一地区政策的改变给真主党造成了冲击,因此双方之间产生了战略上的分歧。而在分歧产生之前,真主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武器存量,且叙利亚也需要真主党作为其代理人防止以色列方面的突然袭击。所以即使叙利亚与以色列和谈,真主党的军事实力也不会受到打击。真主党的首要考量是其在国内的社会支持度是否会降低。而真主党此时刚刚转型成为黎巴嫩的主流政党,其动员叙事也从“泛伊斯兰主义”转变为了“反以色列思想”,需要在黎巴嫩国内维持稳定且足够的社会支持。如果这时叙利亚和以色列和谈,真主党的动员话术会受到巨大打击,其在阿拉伯世界以及黎巴嫩国内树立的政治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其军事潜力极有可能遭到削弱。因此,真主党选择采取“抗议”的方式,即没有实质性的反叛行为,官方也无明确反对态度,但是会动员组织成员上街抗议,以巩固现有的社会支持,强化意识形态宣传,维护自身的军事潜力。

① Mohamad Hage Ali, “Power Points Defining the Syria-Hezbollah Relationship,” https://carnegie-production-assets.s3.amazonaws.com/static/files/Hage_Ali_Hezbollah_final1.pdf, p. 9.

② Anoushiravan Ehteshami and Raymond A. Hinnebusch, *Syria and Iran: Middle Powers in a Penetrated Regional Syst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46.

表 4 变量测量结果

案例	若放弃追随,是否会影响生存	继续追随,军事实力是否会变化			继续追随,军事潜力是否会变化	
	是否有其他委托方可合作且在国内斗争中没有面临威胁	武器储备	兵员素质	资金支持	理念宣传能力	社会服务能力
1969 年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	否,在国内有库尔德爱国联盟和伊拉克新政府的威胁,且没有其他委托方可选择。					
2016 年叙利亚库尔德军	是,美国仍然需要叙利亚库尔德组织消除恐怖组织,叙利亚库尔德组织可以选择与俄罗斯阵营合作。	是	是	是	否	是
2011 年哈马斯组织	是,哈马斯对加沙地区的控制非常稳固,在国内没有面临生存威胁。	是	是	是	否	否
1991 年真主党	是,尽管当时的黎巴嫩被叙利亚牢牢控制,但是伊朗政府一直在资助真主党,且当时的黎巴嫩已经结束内战,真主党并没有面临重大的生存威胁。	否	否	否	是	否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表 5 案例总结

案例	军事实力	军事潜力	策略选择
1969 年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			追随
2016 年叙利亚库尔德军	下降(满足三个指标)	不会下降(满足三个指标)	背离
2011 年哈马斯组织	下降(满足三个指标)	不会下降(满足三个指标)	退出
1991 年真主党	不会下降(满足三个指标)	下降(满足三个指标)	抗议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 论

自冷战以来,作为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众多武装组织不断出现,持续受到国际社会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从武装组织在内战中的结盟机制,到国家与武装组织间关系的差异化,再到武装组织的个案研究,学者们围绕

着这一主题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用历史案例作为证明,研究了武装组织在面对与委托方国家产生分歧时的策略选择和考量,尝试跳出既有文献主要以国家视角去分析委托—代理关系的这一窠臼。本文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武装组织的视角去观察分析国家—武装组织间关系,试图更好地完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框架;同时将武装组织的决策黑箱打开,并将研究议程从内战研究中扩展出来,以更好地理解武装在国际社会上发挥的作用。本文的现实意义则在于更好的理解中东地区武装组织应对不同场景的策略选择,为其行为逻辑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框架。

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虽然国家—武装组织间权力关系并不平衡对称,但武装组织仍然在这段关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可以选择维持或退出这段关系。第二,武装组织在决定是继续追随还是放弃追随委托方国家时,首先会考虑在放弃追随后是否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即是否存在快速消亡的风险。如果选择反叛后武装组织的生存会面临即时的严重威胁,那么不管与委托方国家存在怎样的分歧,武装组织都会倾向选择继续追随。第三,在确定放弃追随不会面临生存威胁后,武装组织会衡量继续追随的代价,主要考虑其选择对军事实力与军事潜力造成的影响。武装组织会先考虑军事实力是否会被削弱,再考虑军事潜力是否会发生变化。当继续追随会导致军事实力被削弱,且军事潜力也会被削弱时,武装组织会选择“背离”,即加入对手阵营;当继续追随会导致军事实力被削弱,但是军事潜力不会有显著变化时,武装组织会选择“退出”,即和原阵营切断关系,但是也不与对手阵营合作;当继续追随不会导致军事实力被削弱,但是军事潜力会被削弱时,武装组织会“抗议”,即行为上留在原阵营,但是动员民众或者组织成员发动抗议,以表达组织官方的不满。上述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性地理解和研判武装组织的逻辑和行为,也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与秩序演进。